

# 政策执行偏差严重程度对 公众地方政府责任判断的影响机制\*

周 云<sup>1,2</sup> 刘建平<sup>\*\*1</sup> 王鑫强<sup>1</sup> 许秀芬<sup>2</sup>

(<sup>1</sup>江西师范大学心理学院, 南昌, 330026) (<sup>2</sup>遵义师范学院教师教育学院, 遵义, 563006)

**摘 要** 为探讨地方政府政策执行偏差严重程度对公众地方政府责任判断的影响机制。采用问卷法对 728 名社会公众进行调查, 结果显示: (1) 公众地方政府有意性判断和公众地方政府可控归因中介了政策执行偏差严重程度对公众地方政府责任判断的影响。(2) 政策执行偏差严重程度还通过公众地方政府有意性判断→公众地方政府可控归因这一中介链作用于公众地方政府责任判断。并对研究的实践启示进行了讨论。

**关键词** 政策执行偏差严重程度 公众地方政府责任判断 影响机制

## 1 引言

当今社会, 由于地方政府政策执行偏差或不当行政损害公众利益所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层出不穷, 对社会稳定和政府声誉产生了极大的危害 (Wang, Zhang, Zhou, & Feng, 2014)。根据人际归因及责任判断模型的观点 (Rudolph, Roesch, Greitemeyer, & Weiner, 2004; Weiner, 2000), 由于地方政府政策执行偏差造成后果的消极性, 公众会对作为政策执行主体的地方政府进行责任判断, 判断地方政府对政策执行偏差的不良后果应当承担多大的责任。并且公众对地方政府应承担责任的判断是地方政府政策执行偏差情境下公众对地方政府反应的社会心理基础, 决定了公众对地方政府的情绪和行为反应。

结果信息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作出判断、决策以及行为反应的重要依据。有害结果的严重程度会正向影响人们对行为主体的责任判断和应受惩罚判断 (Alicke, 2000; Mazzocco, Alicke, & Davis, 2004)。对于结果严重程度如何影响人们的责任判断, Malle, Guglielmo 和 Monroe (2014) 的责备理论认为人们对行为主体的有意性判断中介了结果严重程度和人们对行为主体的责任判断之间的关系。对行为主体有意性的研究也发现人们对行为主体故意造成有害结果的判断使得人们增大对行为主体道德责任和应受惩罚的判断 (Lagnado & Channon, 2008;

Nobes, Panagiotaki, & Pawson, 2009)。据此提出研究假设 1: 地方政府政策执行偏差情境下, 公众地方政府有意性判断中介了政策执行偏差严重程度与公众地方政府责任判断之间的关系。

Weiner (2000) 的人际归因与责任判断模型认为人们对行为主体的可控归因是决定行为主体责任大小的核心因素。无论是有关个人责任判断的研究还是有关组织责任判断的研究, 可控归因都被认为是决定人们责任判断的关键因素 (瞿雯, 高隽, 官锐园, 2016; 王志良, 2012; 张爱卿, 刘华山, 2003; Coombs, 2007; Weiner, 2000)。当有害结果严重程度增加, 人们会增加对组织的可控归因, 在组织可控归因的作用下提高对组织责任的知觉, 人们对组织的可控归因中介了结果严重程度对组织责任知觉的影响 (Kelley & Michela, 1980)。基于此, 提出研究假设 2: 地方政府政策执行偏差情境下, 公众对地方政府的可控归因中介了政策执行偏差严重程度与公众地方政府责任判断之间的关系。

在道德责任判断中, 人们对事件因果关系的认识受到人们对行为主体有意性判断的影响。研究表明当行为主体具有有意性时, 人们更倾向对行为主体做出可控归因, 即便行为主体的行为完全一致也会得出相同的结论 (Alicke, 2000; Gilbert, Tenney, Holland, & Spellman, 2015)。结合前文所述, 结果严重程度会影响人们对行为主体的有意性判断

\* 本研究得到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14BSH071)、贵州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项目 (14ZC309) 和江西省高校人文社科项目 (XL1519) 的资助。

\*\* 通讯作者: 刘建平。E-mail: liujianping@jxnu.edu.cn

DOI:10.16719/j.cnki.1671-6981.20180422

(Malle, Guglielmo, & Monroe, 2014)；人们对行为主体的有意性判断又会影响到人们对行为主体的可控归因(Gilbert et al., 2015)；人们的可控归因最终会影响到人们对个体或组织的责任判断(Lange & Washburn, 2012)，这样就形成了一个中介链。链式中介是指多个中介变量按照一定顺序形成中介链，预测变量通过中介链对结果变量产生间接效应(柳士顺, 凌文轻, 2009)。据此提出研究假设3：地方政府政策执行偏差情境下，政策执行偏差严重程度通过公众地方政府有意性判断→公众政府可控归因这一中介链作用于公众对地方政府的责任判断。

综上所述，地方政府政策执行偏差情境下政策执行偏差严重程度对公众地方政府责任判断的影响可能存在三条中介路径。具体如图1所示：地方政府政策执行偏差严重程度可能通过公众地方政府有意性判断的中介作用于公众地方政府责任判断；也可能通过公众地方政府可控归因的中介作用于公众地方政府责任判断；还可能通过公众地方政府有意性判断→公众政府控制归因这一中介链作用于公众地方政府责任判断。通过对以上假设的检验可以进一步了解地方政府政策执行偏差严重程度如何通过公众的内部加工影响公众地方政府责任判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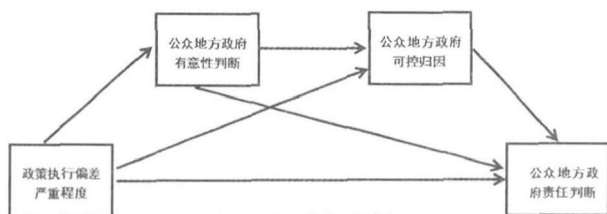


图1 研究假设示意图

## 2 研究方法

### 2.1 被试

被试来源于江西省九江市、吉安市、新余市三个地级市的星子县、安福县等四个县共23所中学的学生家长。在选取学校时根据1:1的比例选取主要生源地是农村和主要生源地是城镇的中学。共抽取县城初中8所，县城高中6所，乡镇初中8所，乡镇高中1所。每所学校随机选取1个班的家长作为被试。共有728名具有社会经验的学生家长参与调查，涵盖十大职业分类、各年龄阶段、各社会阶层。实测回收有效问卷597份，回收率82.01%。其中男性400人，女性197人；城镇351人，农村246人；20~30岁40人，30~40岁154人，40~50岁340人，50~60岁31人，60岁以上32人。

### 2.2 问卷测量项目

#### 2.2.1 地方政府政策执行偏差事件

该项目在对18名基层公务员及30名公众访谈的基础上编制而成，包括房屋拆迁、土地征收、医疗保险、社会保障、环境治理、食品药品监管等22种常见的政策执行偏差事件。包括“当地基层政府没有按规定进行土地征收，利益受到损害”等。被试根据自己近一年的真实情况对问卷上所列地方政府政策执行偏差事件进行“是”或“否”的回答。

#### 2.2.2 地方政府政策执行偏差严重程度

该变量参考徐彪(2014)关于危机事件严重程度的题干和选项，根据专家的意见进行了适合测验情境的修改，最终形成2个题项，包括“当地政府没有落实好该项政策对您的利益造成了很大的损失”等两个题项。被试在非常同意到非常不同意的Likert 5点量表上进行回答。两个题项的相关系数 $r=.857$ ，信度较好。

#### 2.2.3 公众地方政府可控归因

该变量参考McAuley, Duncan和Russel(1992)的归因维度问卷中关于控制归因的题干和选项，根据专家的意见进行符合施测情境的修改，最终形成2个题项，包括“当地政府没有落实好该项政策的原因在当地政府控制范围之内”等。被试在非常同意到非常不同意的Likert 5点量表上进行回答。两个题项的相关系数 $r=.846$ ，信度较好。

#### 2.2.4 公众地方政府有意性判断

该变量参考Campbell(1999)研究中关于有意性判断的题干和选项，根据专家的意见进行符合施测情境的修改，最终形成3个题项，包括“该项政策没有落实好是当地政府不考虑广大群众的利益所导致”等。被试在非常同意到非常不同意的Likert 5点量表上进行回答。三个题项的Cronbach's  $\alpha=.815$ ，信度较好。

#### 2.2.5 公众地方政府责任判断

该变量参考徐彪、陆湾湾、刘晓蓉和张浩(2016)研究中关于政府责任判断的题干和选项，根据专家的意见进行符合施测情境的修改，最终形成2个题项，包括“当地政府对没有落实好该项政策损害您利益的情况应承担全部的责任”等。被试在非常同意到非常不同意的Likert 5点量表上进行回答。两个题项的相关系数 $r=.851$ ，信度较好。

### 2.3 施测过程

在各初、高班级家长会后进行问卷调查。每个

班级的问卷调查均由 6 名经过培训的大学生调查员进行, 每名大学生调查员负责对 4~8 名家长进行问卷调查。问卷调查前由主试宣读指导语, 强调本次调查的匿名性、保密性和数据仅用于科学研究之用。要求家长根据自己真实的想法进行回答, 回答完毕后立即回收问卷, 并给予家长价值 10 元的小礼品作为酬谢。

#### 2.4 数据筛选与处理

采用 SPSS 21.0 和 Mplus 7.2 软件对筛选后的数据进行分析处理。

### 3 结果分析

#### 3.1 共同方法偏差控制与检验

本研究中通过被试自陈法收集数据, 可能存在共同方法偏差。因此, 在问卷具体施测的过程中采

取严格的程序控制: 强调本次问卷调查的匿名性、保密性和数据仅用于科学研究之用等。对可能存在的共同方法偏差进行检验, 采用周浩和龙立荣(2004)提出的验证性因素分析方法进行对“单一因素解释了所有变异”这一假设进行检验。将公因子数设定为 1, 结果如下  $\chi^2=921.57$ ,  $\chi^2/df=34.13$ , CFI=.67, NNFI=.56, RMSEA=.236, SRMR=.107; 各项指标均显示模型拟合不好, 不支持假设。说明本研究共同方法偏差问题在允许的范围内。

#### 3.2 相关分析

从表 1 可知, 政策执行偏差严重程度、公众地方政府有意性判断、公众地方政府可控归因、公众地方政府责任判断四个变量之间两两均相关显著, 符合链式中介模型的要求。

#### 3.3 中介效应检验

表 1 各变量描述统计及相关

变量	平均数	标准差	1	2	3	4
1.政策执行偏差严重程度	3.02	.72	—			
2.公众地方政府可控归因	3.21	.70	.397***	—		
3.公众地方政府有意性判断	3.22	.70	.456***	.430***	—	
4.公众地方政府责任判断	3.20	.71	.424***	.396***	.462***	—

注: \*\*\* $p<.001$

本研究根据温忠麟与叶宝娟(2014)以及方杰、温忠麟、张敏强和孙配贞(2014)推荐的中介效应检验流程进行分析, 采取结构方程模型检验公众地方政府有意性判断、公众政府可控归因在政策执行偏差严重程度和公众政府责任判断之间的中介效应。首先检验政策政策执行偏差严重程度对公众地方政府责任判断的影响, 结果显示样本数据对模型拟合良好:  $\chi^2=3.34$ ,  $\chi^2/df=3.34$ , CFI=.99, NNFI=.98, RMSEA=.063, SRMR=.008。政策执行偏差严重程度能够显著正向预测公众地方政府责任

判断 ( $\gamma=.60$ ,  $t=12.79$ ,  $p<.001$ )。

接下来对中介效应进行分析, 结果如图 2 和表 2 所示, 样本数据对模型拟合良好,  $\chi^2=21.42$ ,  $\chi^2/df=1.02$ , CFI=.99, NNFI=.99, RMSEA=.06, SRMR=.014。政策执行偏差严重程度能够正向预测公众地方政府责任判断 ( $\gamma=.26$ ,  $t=4.37$ ,  $p<.001$ ); 政策执行偏差严重程度能够正向预测公众地方政府有意性判断 ( $\gamma=.52$ ,  $t=10.56$ ,  $p<.001$ ); 公众地方政府有意性判断能正向预测公众地方政府责任判断 ( $\gamma=.30$ ,  $t=4.92$ ,  $p<.001$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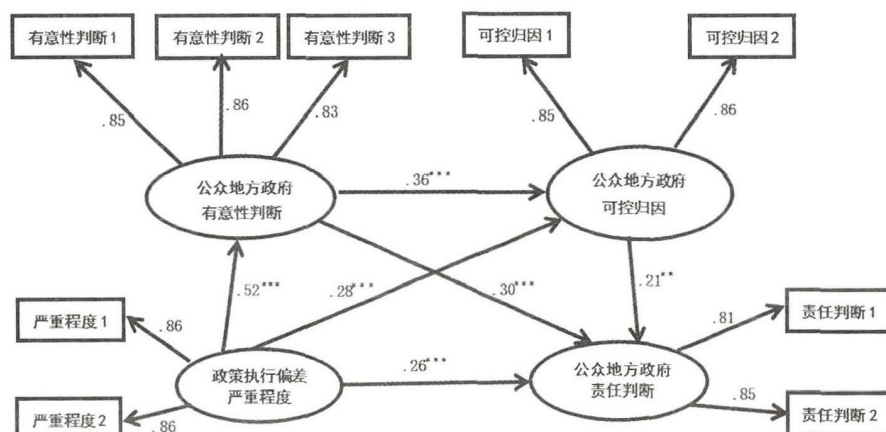


图 2 路径系数



表 2 中介效应 Bootstrap 检验和效果量

路径	效应值	区间 (95%)	效果量
直接路径			
严重程度→责任判断	.261		
中介路径			
严重程度→有意性判断→责任判断	.157	[.092, .222]	.304
严重程度→可控归因→责任判断	.058	[.058, .101]	.113
严重程度→有意性判断→可控归因→责任判断	.039	[.020, .054]	.076
总中介效应	.254		.493
总效应	.515		

采用 Bootstrap 法抽样 1000 次计算公众地方政府有意性判断在政策执行偏差严重程度与公众地方政府责任判断之间的中介效应, 95% 的区间为 [ .092, .222]。因此, 公众地方政府有意性判断中介了政策执行偏差严重程度与公众地方政府责任判断之间的关系。中介效果量为 .304, 研究假设 1 得到验证。

政策执行偏差严重程度能够正向预测公众地方政府可控归因 ( $\gamma=.28, t=4.89, p<.001$ ) ; 公众地方政府可控归因能正向预测公众地方政府责任判断 ( $\gamma=.21, t=3.01, p<.01$ ) ; 采用 Bootstrap 法抽样 1000 次计算公众地方政府可控归因在政策执行偏差严重程度与公众地方政府责任判断之间的中介效应, 95% 的区间为 [ .058, .101 ]。因此, 公众地方政府可控归因中介了政策执行偏差严重程度与公众地方政府责任判断之间的关系。中介效果量为 .113, 研究假设 2 得到验证。

政策执行偏差严重程度能够正向预测公众地方政府有意性判断 ( $\gamma=.52, t=10.56, p<.001$ ) ; 公众地方政府有意性判断能够正向预测公众地方政府可控归因 ( $\gamma=.36, t=6.09, p<.001$ ) ; 公众地方政府可控归因能够正向预测公众地方政府责任判断 ( $\gamma=.21, t=3.01, p<.01$ )。采用 Bootstrap 法抽样 1000 次计算链式中介效应, 95% 的区间为 [ .020, .054], 因此, 政策执行偏差严重程度通过公众地方政府有意性判断→公众政府可控归因这一中介链对公众地方政府责任判断产生作用。中介效果量为 .076, 研究假设 3 得到验证。

## 4 讨论

### 4.1 公众对地方政府政策执行偏差的认知现状

调查结果表明, 地方政府政策执行偏差排名前三位的是: 环境污染治理政策执行偏差、食品和药品安全监管政策执行偏差、社会保障政策执行偏差; 选择率依次为 33%、24%、23.4%。公众的选择结果

既反映了公众最为关心的是与自身利益息息相关的民生问题, 也反映出当地政府对于环境治理和食品安全等民生问题重视程度不够, 不能有效的贯彻上级相关政策。

### 4.2 公众地方政府有意性判断和公众地方政府可控归因的中介效应

本研究结果表明在地方政府政策执行偏差情境下, 公众地方政府有意性判断中介了政策执行偏差严重程度和公众地方政府责任判断之间的关系。Fincham (1982) 曾指出, 有关结果严重程度对道德责任判断影响的研究都是建立在假定行为主体有意性等心理状态恒定的基础上, 需要将行为主体的有意性等心理状态当做可能的中介变量来进行操纵。段蕾、莫书亮、范翠英和刘华山 (2012) 通过实验研究发现, 在对行为主体应当承担的道德责任程度判断中行为主体越是有意的, 被试就越认为行为主体应当为消极后果承担道德责任。今后的研究应注意加强探究行为主体有意性等心理状态因素在人们的责任判断中所起的作用。

本研究发现现在地方政府政策执行偏差情境下, 公众地方政府可控归因中介了政策执行偏差严重程度和公众地方政府道德责任判断之间的关系。这与强调可控归因在责任判断中的重要作用的相关研究一致 (林钟敏, 2001; 王志良, 2012; Coombs & Holladay, 2002)。在地方政府政策执行偏差情境下, 地方政府政策执行偏差所造成的后果越严重, 公众越是会认为是地方政府可控的因素造成了该严重后果, 当然会认为地方政府应该对消极后果承担更大的责任。本研究结果还表明公众地方政府有意性判断在政策执行偏差严重程度与公众地方政府责任判断之间的中介效应效果量要大于公众地方政府控制归因的中介效应效果量。Cushman (2008) 的道德判断双加工模型指出, 在行为主体应承担的责任判断中存在结果归因和行为主体心理状态判断两个相

互竞争的加工过程。在伤害结果由偶然因素引起时,通过归因对行为主体进行道德责任判断;在伤害结果由行为主体引起时,责任判断更多的依赖对行为主体的有意性等心理状态判断。在地方政府政策执行偏差情境下,地方政府与消极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比较明确。因此,对地方政府责任判断起关键作用的不是公众对地方政府的控制归因,而是公众对地方政府的有意性判断。

#### 4.3 公众地方政府有意性判断和公众地方政府可控归因的链式中介效应

本研究还发现政策执行偏差严重程度通过公众地方政府有意性判断→公众政府可控归因这一中介链对公众地方政府责任判断产生作用。根据Alicke(2000)的有罪控制模型(culpable control model),人们在进行责任判断时会对行为主体的控制性信息进行仔细检查,行为主体的控制性信息主要包括三个:因果控制(因果性)、行为控制(有意性)和结果控制(预见性)。人们在对行为主体控制性进行检查的同时也会对结果信息等进行自动的自发性评估(spontaneous evaluation),自发性评估会改变人们对行为主体的控制性的判断并最终影响人们对行为主体责任判断。并且Alicke(2000)认为当行为主体具有有意性时,会提高人们对行为主体与消极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判断,最终影响人们对行为主体的责任判断。因此,在地方政府政策执行偏差情境下,政策执行偏差严重程度会通过公众地方政府有意性判断和公众地方政府可控归因间接作用于公众地方政府责任判断。

本研究主要得出以下结论:政策执行偏差情境下,公众地方政府有意性判断和公众地方政府可控归因分别中介了政策执行偏差严重程度与公众地方政府责任判断之间的关系;政策执行偏差严重程度还可以通过公众地方政府有意性判断→公众地方政府可控归因这一中介链影响公众地方政府责任判断。本研究结果对于地方政府如何应对由政策执行偏差所引发的危机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地方政府在应对由政策执行偏差引发的危机时应当立足于向公众展示地方政府的善意,使公众确信地方政府并不是有意造成政策执行偏差。让公众认为地方政府不是“坏心办坏事”,而是“好心办坏事”,从而减轻公众对地方政府的责任判断及在此基础上引发的愤怒情绪和对抗行为。

#### 参考文献

- 段蕾,莫书亮,范翠英,刘华山.(2012).道德判断中心理状态和事件因果关系的作用:兼对道德判断双加工过程理论的检验.《心理学报》,44(12),1607-1617.
- 方杰,温忠麟,张敏强,孙配贞.(2014).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多重中介效应分析.《心理科学》,37(3),735-741.
- 林钟敏.(2001).大学生对学习行为的责任归因.《心理学报》,33(1),37-42.
- 柳士顺,凌文铨.(2009).多重中介模型及其应用.《心理科学》,32(2),433-435.
- 瞿雯,高隽,官锐园.(2016).大众偏见对医疗纠纷中归因和责任推断的影响.《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4(2),213-217.
- 王志良.(2012).产品危机事件中消费者责任归因的作用机制研究.《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9(4),131-140.
- 温忠麟,叶宝娟.(2014).中介效应分析:方法和模型发展.《心理科学进展》,22(5),731-745.
- 徐彪.(2014).公共危机事件后政府信任受损及修复机理——基于归因理论的分析 and 情景实验.《公共管理学报》,11(2),27-38.
- 徐彪,陆湾湾,刘晓蓉,张浩.(2016).公共危机事件后公众对政府责任感知的形成机制研究.《公共行政评论》,9(6),144-163.
- 张爱卿,刘华山.(2003).人际责任推断与行为应对策略的归因分析.《心理学报》,35(2),231-236.
- 周浩,龙立荣.(2004).共同方法偏差的统计检验与控制方法.《心理科学进展》,12(6),942-950.
- Alicke, M. D. (2000). Culpable control and the psychology of blame.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26(4), 556-575.
- Campbell, M. C. (1999). Perceptions of price unfairness: Antecedents and consequences. *Journal of Marketing Research*, 36(2), 187-199.
- Coombs, W. T. (2007). Attribution theory as a guide for post-crisis communication research. *Public Relations Review*, 33(2), 135-139.
- Coombs, W. T., & Holladay, S. J. (2002). Helping crisis managers protect reputational assets: Initial tests of the situational crisis communication theory. *Management Communication Quarterly*, 16(2), 165-186.
- Cushman, F. (2008). Crime and punishment: Distinguishing the roles of causal and intentional analyses in moral judgment. *Cognition*, 108, 353-380.
- Fincham, F. (1982). Moral judgment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ausal schemes.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12(1), 47-61.
- Gilbert, E. A., Tenney, E. R., Holland, C. R., & Spellman, B. A. (2015). Counterfactuals, control, and causation.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41(5), 643-658.
- Kelley, H. H., & Michela, J. L. (1980). Attribution theory and research.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31(1), 457-501.
- Lagnado, D. A., & Channon, S. (2008). Judgments of cause and blame: The effects of intentionality and foreseeability. *Cognition*, 108(3), 754-770.
- Lange, D., & Washburn, N. T. (2012). Understanding attributions of corporate social irresponsibility.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37(2), 300-326.
- Malle, B. F., Guglielmo, S., & Monroe, A. E. (2014). A theory of blame. *Psychological Inquiry*, 25(2), 147-186.
- Mazzocco, P. J., Alicke, M. D., & Davis, T. L. (2004). On the robustness of outcome bias: No constraint by prior culpability. *Basic and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 26(2-3), 131-146.
- McAuley, E., Duncan, T. E., & Russel, D. W. (1992). Measuring causal

- attributions: The revised causal dimension scale (CDSII).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18(5), 566–573.
- Nobes, G., Panagiotaki, G., & Pawson, C. (2009). The influence of negligence, intention, and outcome on children's moral judgments.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Child Psychology*, 104(4), 382–397.
- Rudolph, U., Roesch, S., Greitemeyer, T., & Weiner, B. (2004). A meta-analytic review of help giving and aggression from an attributional perspective: Contributions to a general theory of motivation. *Cognition and Emotion*, 18(6), 815–848.
- Wang, E. P., Zhang, S. W., Zhou, J., & Feng, J. P. (2014). Administrative errors and discontent: The case studies of mass incidents in China. *Asia-Pacific Studies*, 1(1), 31–43.
- Weiner, B. (2000). Intrapersonal and interpersonal theories of motivation from an attributional perspective. *Educational Psychology Review*, 12(1), 1–14.

# The Mechanism of Influence of Policy Implementation Deviation Degree on Public's Local Governments Responsibility Judgment

Zhou Yun<sup>1,2</sup>, Liu Jianping<sup>1</sup>, Wang Xinqiang<sup>1</sup>, Xu Xiufen<sup>2</sup>

(<sup>1</sup>School of Psychology, Jiangxi Normal University, Nanchang, 330026)

(<sup>2</sup>School of Education, Zunyi Normal College, Zunyi, 563002)

**Abstract** In today's society, there have been various mass disturbances emerging in an endless stream, due to local governments' policy implementation deviation that is injurious to the public interest. Such disturbances have imposed severe damages on social stability and governmental reputation. The further the local government deviates from its original intention and goal for policy making, the severer the consequence it brings to the public. For this purpose,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way that local governments' policy implementation deviation influences on the public's judgment on local governments. This paper conducts a questionnaire survey on 728 citizens from 4 counties including Xingzi County and Anfu County in Jiangxi Province. This paper adopts 5 questionnaires: including questionnaire on local governments' policy implementation deviation degree, questionnaire on public's attribution for self-control of local governments and so on, as well as Mplus software for data collection.

The results have shown that: (1) The public's judgment on local governments' intention and the public's attribution for self-control of local governments mediat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olicy implementation deviation degree and public's responsibility judgment on local governments; (2) Policy implementation deviation degree also had an effect on the public's moral responsibility judgment on local governments through the intermediary chain of the public's judgment on local governments' intention → the public's attribution for self-control of local governments. After comparing the effect size between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the public's judgment on local governments' intention for policy implementation deviation degree and the public's responsibility judgment on local governments, as well as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the public's attribution for self-control of local governments policy implementation deviation degree and the public's responsibility judgment on local governments, it was found that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the former was larger. The policy implementation deviation degree could not only have an effect on the public's responsibility judgment on local governments through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the public's judgment on local governments' intention, but also affect the public's responsibility judgment on local governments through the mediating chain formed by the public's judgment on local governments' intention and the public's attribution for self-control of local governments. It was obvious that in case there was policy implementation deviation for governments, the effect of the public's judgment on local governments' intention on the public's responsibility judgment on local governments was larger than that of the public's attribution for self-control of local governments.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play an enlightening role for local governments to deal with the crises triggered by policy implementation deviations. When faced with such a crisis, local governments should not guide the public to make uncontrollable attribution for policy implementation deviation. Moreover, they should spare no efforts to release good intentions of the local governments to the public, enabling them to believe that the deviation in policy implementation is unintentional. The public should be guided to believe that the local governments are “well-meaning but misguided” rather than intentionally doing so. This is aimed at relieving the public's responsibility judgment on local governments and subsequent moral outrage and aggressive behaviors on this basis.

**Key words** policy implementation deviation degree; public's responsibility judgment on local governments; mechanism